

警惕“潜伏”的二维码扫码陷阱

在电子支付时代，二维码为群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行的，是无处不在的二维码骗局。

扫码付款“没收到”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贾女士去年12月去唐山玩，返京那天，她与朋友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高铁站。

车费是45元，她给司机现金，对方说找不到。她便提出电子支付，司机说扫码就好。“于是，我便扫了副驾驶门把手上的二维码，司机也一直在扭头看着我付款。支付完毕，司机却说没收到，并问我扫了哪里的二维码。看我指着车门把手上的二维码时，司机露出一脸无辜的神情，表示这并不是付款码，也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贴上的。”

无奈之下，贾女士又给司机转了45元。可感觉这就是个圈套。副驾驶的位置上贴了二维码，司机难道真不知道？

共享单车扫码被骗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张先生因扫了

共享单车上假的二维码被骗走99元。

据张先生回忆，当时天比较黑，他看到路边有一辆共享单车，便去扫码，但手机软件并没有跳转到正常的密码页面。“我觉得很奇怪，给客服打了电话。客服说，后台显示该账户并没有支付押金的记录。于是我又扫了一遍，发现还可以继续付款，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张先生发现，原来车后座的二维码已经被用一种近乎于完美的方式刮掉，然后用一张透明的二维码贴纸掉包。

“一般共享单车都有两个二维码，自被诈骗以后，我都是从客户端进行扫码，再三确认后才会转账。”张先生说。

地铁里也有扫码诈骗

孙先生曾在北京地铁上遇到过二维码诈骗。

“有一次坐地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拿着二维码求扫。他声称自己和同学正在创业做一个项目，开发了一个软

件，需要有一定下载量才能获得投资。”孙先生深知创业的艰辛，于是，他扫了二维码，按理说应该弹出一个应用平台的下载页面，结果弹出的是一个杀毒软件提醒有病毒和危险性的链接。

“对方巧舌如簧地对我说，现在是测试阶段，可以下载。看我的态度很坚决了，于是他便悻悻地走了。”孙先生说，“后来我看到官方公布二维码骗局，有一个便是在地铁、公交上求人扫码，然后手机便会被植入木马程序或是跳转到钓鱼网站，银行卡等会被盗刷。”

办理信用卡险些中招

在北京工作的曲女士有一天逛街时，发现某座商厦前的空地上搭了一个挺大的展台，旁边立着办某家银行信用卡送豪礼的展板。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给她介绍相关业务，并说可送很多礼物。

曲女士心动了。“他们让我扫二维码进行相关信息填写。”曲女士她扫了



对方提供的二维码后，页面自动跳转到这家银行的页面，然后又要求她输入原有的储蓄卡号、身份证号、办卡预留电话以及详细地址。

这时曲女士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办新卡要把旧卡的信息输入这么详细，并且扫他们提供的二维码打开的并不是她原有的银行App。“在详细询问后，这些工作人员支支吾吾，并且表示既然不相信，办不办都可以。”

曲女士当即离开。几天后，她到上述银行网点办信用卡时，向工作人员提及那天见到的情形，被告知该行最近并没有做活动。

《法制日报》2017.5.31 文/杜晓



聚焦网络实名制：

会不会增加信息泄露风险

6月1日正式施行的《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实名制”。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热门话题。人们担心实名制会不会增加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让实名制真正成为互联网秩序走向规范的“助推器”，互联网平台及相关管理部门义不容辞。

信息泄露风险会增加吗？

实名制让网民们以真面目示人，如何为他们撑起个人信息的“保护伞”？

目前，各大互联网平台陆续从技术和监管两方面完善自己的防御系统，防止黑客攻击导致用户信息泄露。国家有关部门也陆续出台各项法规，保障互联网用户信息安全。“由此可见，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和个人数据安全已经被提到了国家最高层面，对个人信息的使用、采集等都需要严格的法律程序和明确的法律授权。”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建立实名制，实际上可以加强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技术监管步伐能跟上吗？

互联网实名制的推行虽然将用户身份从虚拟变成了真实，但据业内人士透露，现阶段从技术上难以实现将个人信息与主机绑定，无法验证身份与终端的一致性，因此真实身份的背后并不一定是操作者本人。

除了技术跟不上之外，监管的缺失也助长了“人机不一致”现象的泛滥。有专家指出，目前对于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如何执行没有具体的法律解释，对于冒用他人身份注册账号的行为也缺乏对应惩罚措施。

网民言论自由受限制吗？

也有网友质疑推行实名制会限制网民的“言论自由”，甚至导致网络监督意见的流失和监督热情的降温。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教授、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认为，网络实名制是社交媒体发展的趋势，它实际上是将对网民的内在道德约束变成了外在的法律约束。

“我国采取的互联网实名制遵循的是‘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原则，对网民表达自由没有影响，反倒强化了网民的知情权。”朱巍认为，实名制下的民意往往更加真实可信，可以大大减少虚假信息的数量，从而提高有关部门的监管效率。

《人民日报》2017.6.1 文/董丝雨 蒋齐光

海上科考：制度化科普缘何缺位？

从国际大洋发现计划368航次开始到5月31日，近两个月时间里，大洋钻探船“决心”号已和世界各地的学校完成了47场直播连线。其中，超过一半的连线由航次科普专员阿曼达完成。

直播连线只是阿曼达在本航次的工作内容之一。她还管理着“决心”号的博客、推特和脸书。作为“决心”号的“必选动作”，“科普直播连线”通过远程授课的形式，将海洋科学带到孩子们眼前。

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科考航次中，制度化的科普活动却一直缺席。

“决心”号：科普专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向世界各地的孩子直播“决心”号上科学家的日常，再将这样的经历“翻译”成学生和公众能懂的“语言”，是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对科普专员的期待。

任何人都能申请在“决心”号上

来一场地球探索之旅。那么，钱从哪

儿来？科普专员所需全部费用，由美国科学资助项目负责。该机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的管理机构。

另外，科普专员还会得到最高1万美元的“奖金”。其中，5000美元为其在船上工作两个月的补贴，另外5000美元则是航次后的项目经费。

科普专员的工作并不轻松。和科学家一样，他们同样要写每周报告和整个航次的总结报告。航次结束之后，他们还要在学术会议上报告自己的工作成果。

按照惯例，当“决心”号不执行科考任务时，科普活动也不能停。今年7月，“决心”号将从菲律宾驶向澳大利亚，在这段航程中，船上将开设一个短期的“岩石学校”，教师会和年轻科学家一起，在“决心”号上实地体验科学家的工作流程，对岩芯进行测量分析，从而感受一把“真实的科学”。

国内：缺钱缺技术更缺观念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

员丁巍伟在“决心”号上做了多场科普连线，人气颇高。不过，他从未在国内科考船上做过类似的“直播连线”。

多位中方科学家坦言，“科普专员”这一角色，在国内科考航次中难觅踪影；而在航次中开展的科普活动，更是寥寥无几。

丁巍伟表示，技术和钱都不算最大问题。关键还在于理念上是否重视，机制上是否有保障。“科普工作的顺利开展，得有专人和专项资金的投入。”丁巍伟说。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中国办公室主任拓守廷也有同感。“国内科学普及确实还有提高空间。特别是像这种海上科考的科普，大多还只是科学家的自发行为，靠科学家的热情支撑，并没有相应硬件和软件的支持，也没有配套机制。”他特别希望，今后在中国的科考船上，像“决心”号上这样的科普活动也能多起来。

《科技日报》2017.6.1 文/张盖伦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杨钟健先生？

(上接第一版)

我们熟知的很多名词都与杨钟健先生有关

杨钟健先生的很多思想拿到今天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先生最早积极倡导建立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上世纪50年代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期间便参与工作，后由于历史原因，最终成立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先生为首任馆长。但今日，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级的自然博物馆，就不会有生物分类学、古生物研究的大发展，就不会有真正的博物学，这关系到国家、社会、民族的未来。

今天我们熟知的很多名词、提法，也都与杨先生有关。比如，上边说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他就多次在会议、报告中提出，在博物馆内要搞“四史”，即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和人类起源史，因此博物馆的名称要符合实际，应该叫做“自然历史博物馆”。杨先生还强调，博物馆不是展览馆，一定要十分重视后台工作，壮大科研力量。他曾经对时任北京自然博物馆书记、副馆长的张问松说过：“没有强大的后台，前台就搞

不好。后台与前台之比要大10倍。”

“爬行动物”这个名词已经家喻户晓，但在我国古代乃至解放初期，国人都叫“爬虫”“爬虫类”。据著名科普作家刘后一先生回忆，他当时请杨先生审校《脊椎动物学》译稿的时候，提出把“爬虫”改为“爬行动物”，得到了杨先生的大力支持，之后所有专业书籍都改称“爬行动物”，沿用至今。

再比如，我们知道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或“直立人北京种”，原先刚发现头盖骨的时候都叫“中国猿人”或“北京猿人”，这一称呼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来杨先生指出该物种既然已经是人科人属了，“50万年以前，人类早就成长起来了，为什么还叫‘猿’呢？”后来，也是按照杨先生的意见删除了“猿”字。

杨钟健先生在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期间，更是特别关心科普事业的发展。他很早便提出，科学家在完成一篇论文的同时应该完成一篇科普文章。杨先生这一构想，是充分认识到科研与科普之间的紧密关系和重要性才给科技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先生

非常重视科普工作，不仅在自然博物馆馆长职位上践行自己的科普理念，自己还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科考游记、散文等等。

今天我们应当好好纪念杨钟健先生，杨先生有很多思想、品德、言行值得我们了解与弘扬。杨先生曾经给我们指明了很多方向，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目标。未来的工作需要新一代年轻人去继承，这更需要我们去了解杨钟健先生，了解他和当年的那些科学家、学者所作的贡献，了解那段历史。正所谓，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杨钟健先生的呐喊——“大丈夫只能向前”，对我们今天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是一种激励，在博物馆事业、科普事业、博物学事业、分类学事业等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不少困难和困惑，但杨先生给了我们一点儿不怕阻挠、敢于直面的勇气。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高级工程师，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人。感谢中科院之声供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供照片。)